

被神化的勝利：施琅收復臺灣後的宗教敘事與治理智慧

張企申¹，張嘉玲²

摘要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施琅率清軍平定臺灣，成就一段影響深遠的歷史傳奇。本文旨在從宗教敘事的角度探討施琅如何利用媽祖信仰建構政治智慧，不僅將戰爭勝利歸功於神明庇佑，而且通過這一策略實現身份重建、政權合法性建構以及邊疆治理的軟性轉化。通過對《靖海紀事》《靖海侯奏疏》《靖海侯年譜》等原始文獻的研讀，以及對相關學術文獻的梳理，本文提出：施琅借助宗教符號與儀式，將媽祖信仰制度化，使之成為國家治理的重要文化資源，同時淡化個人政治爭議，建構出「神 - 政互動」的治理範式。

關鍵詞：施琅、媽祖信仰、政治智慧、宗教敘事、清初治理

壹、引言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施琅率清軍擊敗鄭氏政權，收復臺灣，不僅完成清廷統一海疆的大業，更為清初邊疆治理奠定制度基礎。作為軍事統帥，施琅的戰略謀劃與戰功無可置疑；然而，其在戰後所採取的政治敘事路徑，即多次將勝利歸功於「媽祖顯靈」，却常被視為單純的謙詞，未受到足夠重視。本文指出，施琅作為福建水師提督，主持修建了媽祖廟，展現了其在政治中巧妙運用媽祖信仰來鞏固統治的政治智慧。

本文涉及的核心理論概念主要包括象徵政治（**Symbolic Politics**）與宗教制度化（**Institutionalized Religion**）。象徵政治是統治者或政治行動者運用富含象徵意義的符號、儀式和語言，塑造並鞏固自身合法性，同時建構社會共識的治理手段。這種策略通過使用超越個體的符號體系，使政治議題或行為獲得更廣泛的社會接受與認可。宗教制度化意味著宗教信仰由地方自發實踐，逐步融入官方禮儀與行政管理，形成穩定的儀式化、制度化治理模式。宗教制度化不再僅是個人或地方的信仰表達，更成為國家意識形態與權力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林美容，2003）。

施琅利用宗教象徵，將個人功績神聖化為「天意所歸」，並通過神明中介，減輕「二度歸附」的歷史負擔，推動媽祖信仰制度化，助力清廷在臺灣建立文化認同與治理合法性。換言之，媽祖不僅是戰後的「護國天后」，更成為清廷統治邊疆的象徵性資源。施琅由此在神 - 政互動之間，完成了從戰爭勝利到文化統合的治理轉譯。

¹ 張企申，泉州信息工程學院副教授，E-mail：chishen.chang@gmail.com

² 張嘉玲，世新大學管理學碩士，E-mail：jimchang178@gmail.com

本論文經 2 位雙向匿名審查通過。收稿：2025 年 4 月 28 日。同意刊登：2025 年 5 月 10 日。

本文試圖以施琅戰後政治智慧為切入點，結合象徵政治與宗教社會學的理论視角，重新審視其在收復臺灣後所展現的「非軍事」型治理能力。通過《靖海紀事》《靖海侯奏疏》《靖海侯年譜》等文獻，本文將系統探討以下三個核心問題：一、施琅為何選擇以「媽祖顯靈」作為戰後敘事策略？二、他如何借助這一宗教符號推動媽祖信仰的國家化？三、此一策略如何協助其自我淨化並實現邊疆治理的文化轉譯？通過這些探討，本文不僅有助於深化對清初政教互動機制的理解，也為當前文化治理、象徵政治研究提供歷史借鑒。

貳、施琅歸功於媽祖的政治策略

一、戰功歸神：從個人榮耀到政治布局

清廷平定臺灣後，施琅作為統帥，其軍事才能無可爭議，他成功收復臺灣，鞏固了清朝在東南沿海的統治。在《靖海侯奏疏》中，施琅寫道：「臣等水師自廈門啓行，一路順風，賊艦望風披靡，皆賴天恩及聖母媽祖顯靈護佑。」（施琅，1683/1991，頁 153）。他的軍事行動和戰略決策，包括在不利的自然條件下堅持出征，都顯現了他對天恩和神靈的依賴。這種「歸功於神」的表述，不僅體現了傳統文人的謙遜修辭，更是一種政治策略的運用。例如，在清朝統治臺灣期間，官員們推崇媽祖信仰，通過修建媽祖宮廟和皇帝賜匾額等方式，將媽祖信仰與政治穩定相結合，以此掩蓋權力個人化的風險，並將戰功轉化為「國家與神明共同意志的實現」。在康熙帝尚未完全決定臺灣歸屬的時刻，施琅巧妙地運用「天命」與「神助」的概念，為清廷在臺灣的統治建構了一層象徵性的合法性外衣，從而施加了一種道德上的壓力。他將媽祖的「神聖性」嵌入國家統一大業之中，使清廷「接納臺灣」不僅是權宜之計，更顯得「順應天意、神明所歸」。這種說法可被視為所謂的「象徵治理」，即通過天意與神靈話語塑造政權合法性的文化手段。

二、媽祖信仰與邊疆治理的巧妙對接

施琅深諳媽祖信仰在閩南與臺灣民間的影響力。他在戰後積極主張在臺灣各地恢復、修建媽祖廟宇，並促請朝廷對媽祖「加封晉爵」，最終促成康熙帝於 1684 年冊封媽祖為「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后」，納入國家祀典（陳支平，2010）。此舉不僅慰藉了地方百姓的信仰之情，更為清朝政權迅速披上了一層「文化正當性」的光輝外衣。宗教社會學認為，地方信仰一旦被納入國家禮制體系，便成為「治理秩序的一部分」（侯坤宏，2014，頁 93）。施琅憑藉媽祖的神聖地位，巧妙地搭建起清政權與臺灣民衆之間的認同之橋，將原本剛硬的軍事征服轉化為神明的溫柔感召，從而實現了統治的軟著陸。

三、化解個人身份爭議的象徵智慧

施琅曾效命於鄭芝龍與鄭成功，後又降清，在清廷內部始終面臨「二心之嫌」。他在戰後頻繁強調媽祖護佑、神明主導，此舉既降低了個人功績的彰顯度，又主動模糊了自身複雜的政治背景，將自己定位為「天命執行者」，而非野心勃勃的將領。通過採用「自我去權力化」的語言策略，他成功消除了清廷對其擁兵自重的擔憂，並進一步鞏固了自己的忠誠形象。林美容（2003，頁 45）指出：「神明的中介作用，可以為政治人物提供象徵淨化的通道」。施琅以媽祖顯靈為名義呈報勝利，實際上是一次精巧的政治自保操作。施琅收復臺灣後歸功於媽祖，並非出於純粹的宗教虔誠，而是其作為政治家高度策略化思維的表現。他將媽祖信仰融入國家統一敘事之中，利用神聖化語言建構合法性，凝聚民心，並消除身份爭議，這展現了清初邊疆治理中政教互動的複雜性。媽祖不僅是海神，更在施琅的政治語言中，成為統一臺灣的文化密碼與治理象徵。

參、媽祖信仰的制度化與國家治理

一、地方信仰的國家化：從廟宇到祀典

在施琅收復臺灣並上奏《恭陳臺灣利害疏》後，清廷不僅接受其「臺灣不可棄」的建議，更對其提出的「加封媽祖」主張予以積極回應。1684 年，康熙帝正式敕封媽祖為「天后」，將其列入國家祭祀體系。康熙二十三年(1684 年)八月二十四日，康熙皇帝敕封媽祖為「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宏仁普濟天后」，並將其列入國家祭祀體系。此舉意味著原本根植於福建沿海與臺灣民間的區域性信仰，正式轉化為國家認可的神聖象徵（林美容，2003）。這一信仰的制度化進程，不僅標志著宗教榮譽的提升，更蘊含了深遠的政治意義。首先，它為清廷統治新附之地提供象徵性及合法性。臺灣原為鄭氏抗清基地，清軍雖取之以武力，却需以文化手段實現心理統合與政治整合。媽祖作為「海上守護神」，早已深入人心，其由「民神」轉化為「國神」的過程，正如侯坤宏（2014，頁 89）所言，是「帝國借用信仰體系完成邊疆認同建構的典範」。

二、神權與王權的合謀：媽祖廟的政治功能

施琅不僅在奏疏中推崇媽祖，更積極推動在臺灣重建或新建媽祖廟宇。他在臺灣設廟之舉，並非單純的信仰實踐，而是以廟宇為空間節點，建立國家權力在地方的象徵性延伸。廟宇的設置、祭典的舉辦、文武官員的參與，皆成為「國家治理的儀式化路徑」（陳支平，2010）。例如，清廷特別批准在台南建媽祖廟，並定期由地方官主持祭典，不僅彰顯對神明的尊崇，更實際發揮了「安撫士民與引導認同」的作用。在此意義上，媽祖廟成為清朝治理臺灣的「文化前哨」。透過信仰空間的制度化運作，國家政令得以穿透地方社會，而不必一味依賴高壓軍政手段。此外，這些廟宇也承擔起傳播清廷意識形態、抹平舊政權印記的功能。鄭氏政權的信仰體系在清廷的主導下，以媽祖廟為典型

代表進行了重構，此舉既保留了民間文化的精髓，又對其政治意義進行了重新詮釋，從而實現了「新朝信仰重塑」的戰略意圖。

三、民間信仰與政權整合的「軟治理」模式

施琅倡導以媽祖信仰安撫軍民、建構共識，體現出清初統治者在邊疆治理中的「軟治理」思維。相較於單純依靠軍隊與行政控制，施琅深知「得人心者得天下」，因而在政治建言中反復強調宗教文化與治理的結合。這一策略也反映了清廷對地方統治的高度彈性。面對文化多樣、歷史上存在敵意的地區，清廷並未强行推廣儒家正統思想，而是借助施琅等「地方中介者」的力量，巧妙地將原有的民間信仰融入國家體系之中，既保留了其地方性特色，又使其服務於國家的整體目標。如制度化宗教是國家力量在社會中創造秩序的一種自我合法化機制，因此，媽祖信仰的國家化不僅為施琅提供了政治操作空間，也為清廷提供了文化治理模板。這種「政 - 教合謀」並非政教合一，而是一種象徵資本與行政權力之間的協作，使國家治理更具滲透力與柔性控制效能。施琅推動媽祖信仰制度化，體現了其政治智慧。他不僅將媽祖神聖化為國家意志的代表，還通過官方主導的媽祖宮廟建設，將信仰空間轉化為治理空間。此舉不僅穩固了施琅的歷史地位，也使清廷在臺灣的統治具備了文化的深根基礎。例如，施琅主持修建了臺灣第一座官建的媽祖廟，康熙皇帝還親自賜匾額，顯示了清朝皇帝對媽祖信仰的重視。媽祖信仰在戰後的制度性建構，成為政治穩定和社會調和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肆、以宗教敘事淡化個人爭議的政治智慧

一、二度歸附的政治風險與歷史包袱

施琅早年投效鄭芝龍，後又歸順鄭成功，曾長期服務於明鄭抗清陣營。1666年因與鄭成功意見不合叛出鄭氏，投降清廷（李國禎，2007）。雖然他於1683年率軍平定臺灣，立下大功，但其「二度歸附」的經歷在清廷中始終是敏感話題。清朝政權雖接納其戰功，却未完全消除對其忠誠度的疑慮，特別是在康熙時期強調「慎防功高震主」背景下，施琅必須謹慎處理自己在政治上的定位與表達。

在此情勢下，施琅選擇將戰功歸於「媽祖顯靈」，主動淡化自己的中心角色，是一種具有高明政治判斷的象徵性操作。他精心編織了一場「天命所歸」的勝利神話，將赫赫戰功歸諸神祇，既巧妙地規避了「功高震主」的潛在危機，又巧妙地繞開了忠誠質疑的漩渦。

二、「神助清軍」話語的修辭結構與功能

在施琅的奏疏中，多次出現「賴神靈護佑、媽祖顯化、神威所至、賊兵披靡」等表述（施琅，1683/1991）。這些表述背後，並非僅僅是宗教虔誠的體現，更是深思熟慮的政治修辭策略。其作用至少包括：

- (一) 去個體化：將勝利功勞分散於「神明」與「國威」，減少對將領個人能力的強調。
- (二) 彰顯謙卑：塑造忠誠形象，回避邀功之嫌，符合清代「文臣謙退、武將克己」的政治倫理。
- (三) 製造命運感：將軍事勝利提升為「天命所歸」，塑造不可違逆的政治合法性氛圍。

這種語言策略，恰如通過象徵性外部代理，將統治行為的道德壓力從權力個體轉移至超越性的象徵系統。

三、借神明中介淨化政治形象

施琅將媽祖置於軍事勝利與清廷恩典之間，實際上塑造了一種「忠誠的中介者」角色：他既是接收神諭的人，又是傳達朝廷旨意的將領。借助這一特殊的角色定位，施琅成功實現了自我身份的政治淨化。他不再是那個從敵營歸順的將軍，而是成為了受神引導、順應天命的使者。林美容（2003）指出，地方神明在中國政治文化中常被用來「淨化邊緣人物的政治污點」，而施琅正是此一機制的典型受益者。借由宗教敘事，他不僅重塑了忠誠形象，還被清廷塑造為「神選之將」，原有政治爭議被巧妙淡化，轉而被視為具有戰略意義的靈活角色。此外，施琅在戰後堅辭升爵，反復請求致仕，也表現出「功成身退」的政治姿態。這種退讓與其「歸功於神」的話語系統相互配合，構成一種低調却極具政治操作性的自我定位策略（陳支平，2010）。

施琅並非以戰爭勝利為終點，而是憑藉對政治氛圍的精準判斷，將自己定位為「神明之助、國家意志的執行者」，成功淡化了其政治爭議與個人歷史包袱。他利用媽祖這一神聖符號，實現了從邊緣將領向「國家功臣」的身份轉變，彰顯出深刻的權力認知與政治智慧。這種「象徵性自我去權力化」的策略，為他在複雜的清廷政治結構中贏得了安全空間與榮譽結局。

伍、神 - 政互動的長遠影響與歷史啟示

一、神 - 政互動模式在清初邊疆治理中的延續

施琅借助媽祖信仰建構的神 - 政互動模式，不僅在臺灣治理初期發揮了關鍵作用，也為清初其他邊疆治理提供了示範。清廷在後續對沿海及邊疆地區的統治中，常借用地方傳統信仰來增強政權合法性，形成了「以神治民」的特有治理邏輯（侯坤宏，2014）。不過，這種策略在清廷內部也引發了爭議。部分官員擔憂，過分倚重神明治理的模式或會削弱中央政權的至高無上地位。例如，一些滿族官員擔憂地方神祇的力量可能成為地

方權力抵制中央統治的潛在工具。然而，康熙帝則持相對開放的態度，他強調：「邊疆之地，風俗迥異，適當尊重地方信仰，更易收服人心」（《清聖祖實錄》卷八十）。由此可見，康熙帝對施琅策略採取了一種務實且審慎的支持態度，使得「以神治民」的模式得以延續並推廣。

二、宗教符號在政權合法性建構中的再生產

經由對媽祖信仰制度化歷程的剖析，可窺見宗教符號於國家層面再生產的奧秘。國家利用宗教祭祀、廟宇重建等舉措，不僅鞏固了對地方的文化影響力，還在不斷重構和更新政權合法性的符號體系。這種現象在歷史上具有廣泛意義，對於理解現代政治中宗教與政治互動提供了有益的借鑒。

具體而言，清廷中的漢族官員，如福建巡撫姚啓聖，就積極支持並推動了媽祖信仰的制度化進程，他們認識到，宗教信仰乃文化融合與社會安定之有效手段。但朝廷內一些滿族貴族與八旗將領對此持保留意見，認為過度推崇地方信仰可能削弱皇權的集中統一。康熙帝則展現了高度的政治智慧，他巧妙地平衡了各派系的意見，既適度承認了地方宗教勢力的存在，又對其進行了有效的約束，從而確保了中央政權的穩固以及地方治理的高效運行。

三、歷史啓示與當代治理思考

施琅利用宗教敘事實現政治轉型的策略，反映了統治者在特定歷史背景下對權力合法性與社會認同的深刻洞察。今天，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認同與宗教信仰依然是政治治理中的重要軟實力。通過對清初神 - 政互動模式的研究，學界可為當代政治整合與社會治理提供新的理論視角和實踐啓示。尤其是在處理文化多元的社會環境中，如何合理運用地方信仰等文化資源來增強社會共識與國家認同，成為現代治理的重要課題。

陸、結語

施琅通過將戰爭勝利歸功於媽祖顯靈，成功實現了從邊緣將領到國家功臣的身份轉化，同時為清廷在臺灣乃至更廣區域的統治建構了文化合法性。本文通過對《靖海紀事》《靖海侯奏疏》《靖海侯年譜》等原始文獻的分析，揭示了施琅在政治語言和宗教敘事方面的高超智慧。其「神 - 政互動」模式不僅在清初邊疆治理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也為當代政治中如何利用文化資源、建構合法性提供了歷史借鑒。

具體而言，在多元文化並存的現代治理環境中，政治決策者不妨借鑒施琅的治理模式，巧妙融合當地文化與宗教元素，從而提升政策在民衆中的接受度。例如，新加坡在推動社會融合與國家認同建設時，政府透過公開支持並參與華人春節慶典、馬來族群的開齋節、印度族群的屠妖節等不同族群的重要節慶活動，積極塑造各族群共存共榮的國

家形象，強化了不同族群對新加坡這一多元國家的認同與歸屬感。具體來說，每年農曆新年期間，新加坡政府官員積極參與牛車水的春節慶典，強調文化多樣性與社會和諧；而開齋節期間，國家領導人則參加馬來族群的開齋慶典，展示尊重和包容的態度；屠妖節時，政府舉辦盛大慶典，並邀請不同族群共同參與，以彰顯國家對印度族群文化傳統的重視（Ortiga, Y. Y., 2015）。這些舉措不僅體現了政府對文化的深刻洞察，還極大地增強了社會的凝聚力。

此外，中國近年來在推動「一帶一路」倡議過程中，亦重視當地宗教與文化傳統。例如，在巴基斯坦瓜達爾港建設過程中，中國企業和政府不僅投入基礎設施建設，還積極參與當地文化與宗教活動，資助修建當地的重要清真寺，並參與當地社區舉辦的齋月和宰牲節慶典。這些措施促使當地社會與宗教領袖紛紛公開表達對中國項目的熱烈歡迎與堅定支持，顯著提升了當地社會對一帶一路倡議的認知度與接納度。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案例是中國在非洲國家肯尼亞蒙巴薩建設鐵路項目過程中，也高度重視當地文化傳統。項目方在修復歷史悠久的地方博物館與文化中心的同時，還頻繁舉辦中肯文化交流活動，以此向當地居民彰顯對當地文化的深切尊重與高度欣賞。得益於這種積極的文化互動，中肯兩國民眾間的相互理解和深厚友誼得以持續深化，蒙巴薩鐵路項目也因此贏得了當地政府與社區的普遍支持與認可（Alden, C., & Jiang, L., 2019）。

以上案例表明，在當代國際社會治理中，成功的政治治理模式不僅限於經濟與軍事力量的硬性投入，更需考慮軟性的文化因素。通過象徵政治與文化治理策略，政治領導人可有效地建構跨文化背景下的社會認同與國家合法性，從而實現更為廣泛與深入的社會治理效果。

未來研究可進一步探討這一模式在不同文化和歷史背景下的變遷與影響，特別是針對全球化背景下跨文化治理所面臨的新挑戰，如語言溝通障礙、文化差異、意識形態差異等，以期為更廣泛的政策實踐提供理論與實證支持。具體而言，可以關注如何在國際交流中實現文化治理與經濟合作的有機融合，如何在多元文化社會背景下化解文化衝突，以及如何更有效地利用地方信仰與文化符號來推動區域協調發展。這將為政策制定者和學術研究者提供更具實踐指導意義的理論參考與應用路徑。

參考文獻

- 陳支平 (2010)。海疆治理與閩台關係。廈門大學出版社。
- 侯坤宏 (2014)。媽祖信仰與清代政權合法性建構。臺灣史研究，21(1)，85-108。
- 李國禎 (2007)。施琅與清初統一臺灣。人民出版社。
- 林美容 (2003)。媽祖信仰的國家化與地方化。宗教研究，(4)，41-52。
- 施琅 (1991)。《靖海紀事》(原著 1683 年)。載於黃典權 (編)，靖海侯施琅資料彙編 (第 153 - 167 頁)。福建人民出版社。

Ortiga, Y. Y. (2015). Multiculturalism on Its Head: Unexpected Boundaries and New Migration in Singapor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Integration*, 16(4), 947–963. <https://doi.org/10.1007/s12134-014-0378-9>

Alden, C., & Jiang, L. (2019). Brave New World: Debt, Industrialization and Security in China–Africa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Affairs*, 95(3), 641–657. <https://doi.org/10.1093/ia/iiz083>

Divine Triumph: Religious Narratives and Political Wisdom in Shi Lang's Reconquest of Taiwan

Chi-shen Changⁱ, Chia-ling Changⁱⁱ

Abstract

In 1683, during the 22nd year of Emperor Kangxi's reign in the Qing Dynasty, Shi Lang commanded Qing forces to reclaim Taiwan, shaping a profoundly influential historical legacy.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how Shi Lang utilized Mazu worship within religious narratives to articulate his political wisdom. By attributing his victory to divine intervention, Shi Lang strategically reshaped his identity, legitimized Qing authority, and gently transformed frontier governance practices. By examining primary sources such as Jinghai Jishi, Memorials of Marquis Jinghai, and Chronicle of Marquis Jinghai, alongside scholarly literature, this research highlights Shi Lang's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Mazu worship through religious symbolism and rituals, effectively integrating it as an essential cultural resource for governance. Concurrently, this strategy mitigated personal political controversies and established a governance model characterized by "divine-political interplay."

Keywords: Shi Lang; Mazu worship; political wisdom; religious narratives; governance in early Qing Dynasty

ⁱ Associate Professor, Quanzhou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E-mail: chishen.chang@gmail.com

ⁱⁱ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hih Hsin University. E-mail: jimchang178@gmail.com

The paper was published under two double-blind reviews.

Received: April 28, 2025. Accepted: May 10, 2025.